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符号学研究
已经有大半个世纪历史
许多学者坚持这方向
本书是欧洲学派的成绩展示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欧洲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派

An European School of Marxist Semiotics

张 碧 唐小林 编
周劲松 等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符号学研究
已经有大半个世纪历史
许多学者坚持这方向
本书是欧洲学派的成绩展示

欧洲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派

An European School of Marxist Semiotics



唐小林 编
周劲松 等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近宇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 张碧, 唐小林编; 周劲松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饶广祥主编)

ISBN 978-7-5690-0017-7

I. ①欧… II. ①张… ②唐… ③周…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484 号

书名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ouzhou makesi zhuyi fuhaoxuepai

编 者	张 碧 唐小林
译 者	周劲松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017-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8.125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总 序

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必然是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振臂一呼心血来潮的产物，完全是时代大潮使然。

科技拜物教，创新神话，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超常融合发展，未来 5 至 10 年，人类社会将以难以预料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全面卷入智能时代：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行将终结。万能基因剪刀，可以无中生有任何事物，包括人类自身。3D 打印机任意挥洒想象，塑造世间万物，定制人间万象。万灵的感应器，替代人类全部触觉，海阔天空，上天入地，没有任何障碍，无人驾驶比有人驾驶更加安全。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可穿戴设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参与决策、比特币和区块链共谋、智慧城市，再加上万物互联，人类世界正被彻底改变。人类不再是单方面使用符号的动物，而是符号使用的动物。人类被自己的所造物——符号世界所围困。2016 年，围棋九段世界冠军李世石被机器人阿尔法围棋战败，只是一个颠覆性时代到来的预言。

符号学在世界东方的时兴不是时髦，而是被符号化的时代所唤醒，为窘迫的现实所催逼；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不是应景，而是它的实践品格和未来朝向，使它没有理由放弃对我们当今和即将面临的时代的解释权。面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后果，经典马克思主义响亮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余音未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啸而过。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集结号下，竟然是智能人与自然人的合作或对立，人在与智能合体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救赎，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耸人听闻，人类转型的巨大力量和超级速度，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正视。习以为常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盲目自信，使我们对身边瞬息万变的一切懵懂无知、措手不及。人类高傲的头颅，正在使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面对被符号泛滥甜蜜地淹没的事实，人类越来越丧失面对现实和眺望未来的能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首篇，把商品作为符号，符号就已经是社会生产的物

质基础。事实上，任何商品生产都是物性劳动和智性劳动的结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已内蕴符号价值。当且仅当智性劳动一端在商品生产中迅猛发展，直至一家独大的时候，信息社会、智能时代就已不可避免地到来。符号价值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商品增殖部分，它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内在要素，是构成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们所说的拟真、象征交换等，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从来就不在实在世界之外，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实在世界本身，是对这个实在世界基本特征的指认。用“物质/文化”或“文化/经济”二元论，说不清楚商品和社会问题。要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分析。

说到底，信息社会一切看似玄而又玄的现象，只有回到对经济基础和商品社会的透彻分析才能解决，才能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好像又走偏了路子。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国。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中国有了一个战斗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太多的矛盾与纷争，到如今我们仍然面临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号召力和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思想基础和学术基础，它是建立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透彻洞察、对人类未来走向的清晰判断之上的。它是基于马克思对人类全部知识、文明和思想成果的毕生探究，基于马克思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施蒂纳、蒲鲁东、赫斯、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思想者的反复论辩。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缺失这一重要的基础，往往流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空洞说辞。斯大林时代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基础，不仅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而且与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也有霄壤之别，更不必说对网络时代媒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形态进行缜密分析。丝毫不接地气，也不与时俱进，缺乏知识性、学术性支撑，拒绝与同时代思想交锋，对于亲见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或者毫无解释力的学说，单靠话语传声筒的力量，如何征服人心？意识形态空心化，显然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知识空心化密切相关。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代代表人物葛兰西到第二代的阿尔都塞，到第三代的普兰查斯，再到第四代的拉克劳和墨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已被翻转。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决定于基础逻辑，而是成为基

础逻辑本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变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成”。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话语开始到话语结束，从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终，马克思主义变成单纯的话语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分析的放逐，对“经济主义的马克思”的背离，不仅使社会关系隐匿不见、模糊难辨，也使人类的未来暗淡无光。为批判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正在走向穷途末路，那就是正在演变为学术表演。

符号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处理符号的经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处理符号问题，而不能局限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眼光。符号劳动是商品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符号价值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要处理好符号问题，只有回到经济基础、商品分析。符号从来就不是什么异己力量，学会重视符号、善待符号、理解符号，才能充分开掘和发展符号生产力，才能从被符号奴役的困境中取得主动，实现突围，获得人类的再次解放。而一旦无视事实，把符号视为社会的冗余，文化的毒瘤，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时代发展的洪水猛兽，符号就会被异化，反过来又形塑和异化人类社会。为符号正名，为符号社会立法，重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现实维度，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的学术使命。

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这是我们构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即便这一天就在眼前，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智能人并存的世界，而人类依然能够诗意地栖居，能够与自己的所造物、与无所不在的符号和谐共处，共同奔赴美好的未来。老实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术期待，如此简单，如此辽远，而又如此未知。

目 录

引 论	(1)
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苏珊·佩特里利著 彭佳译 (3)
PART I 亚当·沙夫专辑	(21)
亚当·沙夫的语义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苏珊·佩特里利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周劲松译	(23)
普通语义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亚当·沙夫著 贾佳译	(54)
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	亚当·沙夫著 周子恒 张碧译 (68)
PART II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专辑	(79)
罗西-兰迪的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理论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永祥译	(81)
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著 周劲松译 (92)
面向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维特根斯坦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著 胡易容译	(107)
PART III 杰夫·伯纳德专辑	(133)
杰夫·伯纳德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一份基于研究视野相互欣赏的友谊	
苏珊·佩特里利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任伟译	(135)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的十个论点：一种罗西-兰迪式/维特根斯坦式观点	
杰夫·伯纳德著 周劲松译	(152)
内部/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	杰夫·伯纳德著 赵禹平译 (164)

PART IV 奥古斯托·庞齐奥专辑	(179)
奥古斯托·庞齐奥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璐译	(181)
对等价交换符号学的批判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周劲松译 (213)
关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笔记 ...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周劲松译 (223)
讨 论.....	(233)
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反人本论	保罗·科布利著 方小莉译 (235)
参考书目.....	(252)
附：本书英文目录.....	(280)
编后记.....	(282)

引 论

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苏珊·佩特里利著

彭佳译

一、关于奥古斯托·庞齐奥和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包括笔者自己在内的、本书所收录的诸位论文作者，都是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到“学派”，那么，他们就是以观念的名义而形成的学派。大部分学者都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和生活，故此，这一“学派”并不是因为共同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他们之中，包括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33—2006），奥地利的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1943—2010），意大利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奥古斯托·庞齐奥（Augusto Ponzio，1942），以及笔者本人（1954）。同样，这一学派并没有领袖，但学者通过分享他们的观点、视野、计划、项目和目的，形成了共同的网络，并在将来也会如此，由此，可将我们视为一个“圈子”，大家志趣相投、彼此鼓励，共同协作参与各种项目、讨论以及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称号对我们所有人都恰如其分：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是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证，包括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和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即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阐发与理解。

在上文所提及的诸位学者中，有一位中枢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这一群体的联结之所在：他就是奥古斯托·庞齐奥。从这一学派形成伊始，到维持其群体内部的关系，庞齐奥在其间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不用说他对于笔者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所起到的作用。自罗西-兰迪、沙夫和伯纳德先后于1985年、2006年和2010年去世之后，我们继续研究他们的著述，以出版他们的著作和组织相关会议、研讨会的方式，推进其相关研究。学界持

续进行着关于他们观点的讨论、对话和争辩，相关的论文、专著、译著和会议记录，也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其中，庞齐奥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工作的推进，对于这些学者思想的流传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将沙夫的波兰文、德文和西班牙文著作译为意大利文^①，或是将他们的著述进行重新编辑和出版。事实上，多亏了庞齐奥，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系列的出版；对于沙夫，也是同样如此。

我们致力于使罗西—兰迪的著作得以流传，这也使得另一位符号学大师的著述在意大利被重新发掘和阅读。查理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是由罗西—兰迪译为意大利文并于1954年出版的。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该书于1999年重新出版，并由笔者加写了导言；2009年，该书再版^②。1992年，国际符号学会的会刊《符号学》（*Semiotica*）推出专题，出版了这两位伟大的符号学家之间的通信，笔者和当时《符号学》的主编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 1920—2001）共同为这一期专题撰写了导言（自《符号学》于1969年创刊起，直至2001年西比奥克去世为止，他都是这一期刊的主编）。

在此之前，在西比奥克的帮助下，罗西—兰迪的专著《语言学与经济学》已经于1975年作为“语言入门”系列中的一本，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再往前，罗西—兰迪的另一部专著《语言学相对性的意识形态》，也被收录在西比奥克主持的著名的、为时甚长的“符号学方法”丛书中，由德古意特出版。而现在多亏了庞齐奥的提议，罗西—兰迪以符号学方法研究语言与符号的《语言学与经济学》一书的意大利文版本终于在2016年得以问世。

此外，庞齐奥也推进了将这些学者在世时未经发表的著述加以出版的工作，这里，尤其要提到罗西—兰迪的文集《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该书由笔者编著并加写导言，出版于1992年。这不过是庞齐奥所推动的无数编著工作中的一例而已，在此，笔者非常高兴地将其首推给中国的读者，他们普遍具有英文的阅读能力。当然，罗西—兰迪的其他许多著作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

20世纪70年代，庞齐奥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为奥古斯托·古佐

① 多得庞齐奥之力，自1975年起，沙夫的大部分著作都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包括沙夫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的哲学：沙夫自传》。

② 在罗西—兰迪之后，笔者将莫里斯的其他著作也编译为意大利文的论文集，并于1988年出版，该论文集包括《符号与价值》《表意与意味》里的章节，以及莫里斯在符号学、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其他论文。其后，在2000年，他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表意与意味：符号与价值的关系》也出版了意大利文的译本，而他于1948年出版的《开放自我》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也于2002年出版。

(Augusto Guzzo) 主持的重要意大利期刊《哲学》撰写过罗西—兰迪于 1968 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 1983 年) 一书的书评。随后, 庞齐奥联系了罗西—兰迪, 为其创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期刊《意识形态》提出了论文计划, 该文题为《语言学反常性之意识形态》。该文获得了发表, 加之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赛尔吉奥·皮罗 (Sergio Piro) 的著作《精神失调的语言》亦在 1967 年出版——彼时, 皮罗正致力于对精神病院的制度结构的批判, 这就引发了《意识形态》在后来几期中对语言反常性的讨论。

庞齐奥在论文中记录了罗西—兰迪给他的所有批评建议, 这些意见是由罗西—兰迪在回复给庞齐奥的长信中提出的。该文发表于《意识形态》1971 年第 15 期, 这样的交流开启了庞齐奥和罗西—兰迪长达一生的学术合作和友情, 皮罗也参与其中。《意识形态》及其编辑活动以此为中心, 它于 1972 年停刊以后, 庞齐奥和罗西—兰迪共同创办了一份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的期刊, 即《人文科学》。由于该刊的出版商是位于巴里 (庞齐奥在巴里大学任教, 并生活于此) 的德达罗出版社, 因此整个编辑团队是在巴里, 在庞齐奥的指导下工作的。该刊的第一期出版于 1979 年 4 月, 但不幸的是, 当期刊和德达罗出版社的合作终止之后, 因为没能找到其他出版社, 在 1980 年出版了第 6 期, 也就是最后一期之后, 该刊很快就停刊了。

《意识形态》是由罗西—兰迪和马里奥·萨巴蒂尼 (Mario Sabbatini) 于 1967 年春创立的、反对专门化的非学术季刊, 由罗西—兰迪担任主编, 其首发期收录了罗西—兰迪的论文《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 该文后来收录在 1968 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一书中, 此书是罗西—兰迪的“邦皮亚尼三书”中的第一部, 其后两部则分别是 1972 年出版的《符号与意识形态》, 以及 1985 年出版的《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意识形态》在罗马得以出版, 引发了系列的重要编撰工作, 以及对“意识形态论”丛书的编写, 该丛书和期刊都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为视角进行编写的。

通过从不同方面对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批判, 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 包括以专门化和专业化之名的科学分离主义的去魅^①, 《意识形态》旨在在创新、革

① 关于对科学中的分离主义的批评, 可参见笔者在 2008 年 10 月 17 日成为美国符号学会第七位“西比奥克学者”时, 在美国符号学会的第 33 届年会上大会发言《伦理符号学和责任: 超越分离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本主义》。此文连同笔者的其他论文发表于《美国符号学期刊》2008 年推出的专号中, 之后作为第一章收录在笔者 2010 年出版的《总体视野中的符号十字路口: 伦理符号学与责任》一书中。该书经改写后, 其中文译本由周劲松翻译, 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 2014 年出版, 题目为《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命和去异化方面确立社会规划。这一计划是为了恢复对社会历史现实之无偏见的、非常规的视域,在其副标题“当代历史笔记”中,就可以窥见这种重建与转变。它为历史地理学的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除了刊发的无数单篇文章之外,它曾组织了这方面的专号:1968年的第7、8期为“古巴革命的历史根源”,而1970年长达600余页的第14、15期为“中国革命研究”,该期收录了关于中国(1945-1970)的意大利研究文献的书目,在这两期期刊的尾段列出,长达300页。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庞齐奥于1972年在《意识形态》上发表了《转换语法和政治意识形态》一文,他在文中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理论对语言学理论进行了批判。这多亏了罗西-兰迪的妻子吉纳维夫·沃恩(Genevieve Vaughan, 1939年出生),这位如今移居美国的符号学家、和平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她在礼物经济和母系文化研究方面的观点和著作对学术活动影响甚大——是她向庞齐奥提议,应该将乔姆斯基的某些表述,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及其他书写中的表述,以及美国宪法的《人权宣言》法案的社会政治和语言秩序进行比较,以辨明乔姆斯基的“语言创造性”理论中深藏的意识形态倾向。

同年,此文的法文译本在期刊《人与社会》的专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和亨利·皮埃尔·热迪(Henri Pierre Jeudy)、瑟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罗西-兰迪和沙夫的论文共同发表,而这期专号的葡萄牙文版也在1975年得以出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视野出版社出版的该专号的缩减版(长度为120页)中,也收录了庞齐奥的这篇文章。1973年,当庞齐奥出版专著《语言学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时,他将此文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而该书于1974年被译为西班牙文,1978年被译为塞尔维亚文,1992年,它的重编和扩充版被译为了法文。

关于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在坎皮纳斯大学2010年11月8日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巴西的西里奥·波森蒂(Sirio Possenti)教授如是说:

我年轻时,带着极大的“意识形态愉悦”阅读了庞齐奥教授的这一著作。当时,巴西还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坚持派别认同的左派拒绝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尽管事实上,他的某些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反美”的。他提出的“理想的说与听者”、固有观念说等,都受到排斥。当我在庞齐奥的书中读到对乔姆斯基作品的某些方面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片段的比较,以论证他的观点“乔姆斯基与托马斯·潘恩和杰弗逊的立场相去不远”时,我想,我找到了不喜欢乔姆斯基的绝妙理由。

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庞齐奥和笔者与乔姆斯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庞齐奥关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著作的评论来总结，此话在庞齐奥 1973 年的著作中可以寻见：

对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而不是“政治学家乔姆斯基”——对我们的一些“请求”（比如，关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合作“阿塔那”丛书的邀请（我相信有两位从不交谈的乔姆斯基，一位完全不管意识形态，只谈语言；而另一位只谈意识形态，对其与语言、符号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置一词）——他总是慷慨地回应。我要如是描述我和他的关系：除了零星的信件往来之外，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单向的，至今仍然如此。

庞齐奥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出版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 2010 年 11 月在巴西圣卡洛斯参加巴赫金思想研究大会时遇到的卡洛斯·法拉科（Carlos Faraco）。随后，在 2012 年，法拉科将庞齐奥此书 2006 年的新版本译为了葡萄牙文。

该书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文版，立即促成了庞齐奥与赫那罗·塔伦斯（Jenaro Talens）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友谊，并使得庞齐奥的论文集《文学与哲学之游戏》作为塔伦斯主编的“认识论”丛书中的一本于 1995 年出版，以及庞齐奥关于巴赫金的专著《巴赫金的革命：对巴赫金与当代思想的讨论》于 1998 年由卡提拉出版社在马德里出版。

让我们的话题回到罗西-兰迪上来。就如他在论著中清楚指出的（如，在 2016 年重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引言中所写到的），尽管经济学和语言学看似是两个独立学科，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有待探讨的。他从不认为由专业化的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或语言学是简单的，这两者的研究对象，即作为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语言，和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交换，都是他所关注的焦点，而这两者迄今为止都可能是被单独讨论的。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罗西-兰迪对这两个社会过程都进行了检视，将其暂定为商品方式的货物生产和流通，和语言信息方式的言语生产和流通，这两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尽管它们长期以来是两个独立学科的关注对象，罗西-兰迪却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它们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至少是像一棵树的两个分枝那样。换言之，他认为，当货物以商品形式流通时，它们就是信息；而当言语以语言信息流通时，它们就是商品。

罗西-兰迪于 1985 年 5 月 5 日的早逝是令人震惊而痛惜的，在那之前不久，他还于同年 4 月在巴里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我们，并介绍了《哲学方法与

符号科学》一书。此次研讨会题名为“符号、作者与社会生产”，由罗西—兰迪和庞齐奥共同组织，是对罗西—兰迪此书的第八章《在再生产和超出之间的文本群》的讨论，该文曾以《对一位作者的意识形态研究之标准》为题于1976年发表在期刊《拉美笔记》上。

罗西—兰迪将“社会再生产”描述为人类符号活动，即，历史社会的符号活动作为“所有一切的开始”，也就是哲学思考起源的原型。“总体符号学”的提出者西比奥克将从“生物符号活动”方面来对“符号活动”加以描述，并声称符号活动和生命是一致的，因此，任何生命，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脱离宏观的符号网络，我们的生命领域；与此相似的是，罗西—兰迪所说的“人类符号活动”，或者更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符号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再生产这一符号活动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将这二者的研究并置可知，人类符号域属于更大的生命域，是后者的一部分。

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的作者，涉及“作者”的问题时，便是如此：作者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其中心问题在于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退出”他所属的历史情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超出”。要研究作者的意识形态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提及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再生产，而这需要精确标准之上的识别、描述和判断。在此之上，另一个问题是，要理解在何种条件下，作者在何种程度上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所助益，并能最终超越其边界，或者说至少能展望超越边界，准确地说，是跨越社会历史语境局限的可能。

在对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共识”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中，罗西—兰迪提到了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他是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的创立者之一。对共识的生产是一个符号学现象，换言之，共识是通过我们对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使用而达成的，这些符号系统是文明社会的特征。在这里，罗西—兰迪对作者的分析变得尤为重要，符号的生产作者和作者与社会再生产之广泛共识的生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1987年，在庞齐奥的指导下，我被委以为布鲁诺·韦德马（Bruno Widmar）主办的著名的哲学和文化期刊《普罗泰戈拉》编辑罗西—兰迪的纪念专号的重任。这期专号题名《为了罗西—兰迪》。很快，所发出的征稿通知吸引了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投稿者。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这些作者包括费利切·阿卡梅（Felice Accame）、马西莫·邦凡蒂尼（Massimo Bonfantini）、西尔维奥·切卡托（Silvio Ceccato）、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亚诺什·克莱门 (Janos Kelemen)、罗马诺·卢佩里尼 (Romano Luperini)、罗兰·波斯纳 (Roland Posner)、西比奥克、朱赛佩·塞梅拉里 (Giuseppe Semerari)、塔季扬娜·萨拉马-卡扎库 (Tatiana Slama-Cazacu)、维托里奥·索门齐 (Vittorio Somenzi)、瓦尔特·施密茨 (Walter Schmitz)、图里奥·滕托里 (Tullio Tentori)、特里·斯瑞德加德 (Terry Threadgold), 当然, 还有庞齐奥和笔者自己。

对罗西-兰迪的研究, 不仅在意大利产生了公认的影响, 对广义的符号和语言研究起到的作用也是辐射状的, 这不仅要归功于他的论文专著, 还得归功于他的翻译工作。他所翻译的作者为 20 世纪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其中包括莫里斯、维特根斯坦、吉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古斯塔夫·克林姆 (Gustav Bridgman) 等。

罗西-兰迪不仅为现今所呈现出来的符号科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创造、选择和定义了这门学科的关键术语, 这两者在科学的发展史中往往是携手而至的。事实上, 就如艾柯所说的, 即使是在被忽视之处, 也能发现罗西-兰迪研究的痕迹。在 1985 年 5 月 10 日发表于《共和国》的文章里, 艾柯表达了呼吁那些因为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而自认为不知道他的读者认识他的期望, 并写道: “我想要告诉他们, 他们不研究以往的语言哲学, 而只对像从新闻业到政治、文学作品和视觉语言等日常生活话语这样的话题感兴趣, 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远在 50 年代, 罗西-兰迪就已经作为先锋, 为他们争论过所有相关的基本问题了。”

《普罗泰戈拉》的专号推出之后, 发生了几件事情, 使得罗西-兰迪的观点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继续流传。其中, 在笔者记忆中特别鲜明的有两件事, 因为我们对其有密切的参与: 其一是由庞齐奥和我共同主持、2002 年 11 月 14 至 16 日在巴里大学召开的, 名为“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在今天”的国际会议, 该会议由国际符号学会发起, 由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奥地利和匈牙利符号学会、巴里大学的语言学实践和文本分析系共同组织, 会议记录于 2003 年结集为《无形的著作》一书出版, 是阿塔那“符号学、哲学和艺术”丛书中的一本, 其主题覆盖了罗西-兰迪研究的所有中心议题: 信息和商品、语言工作者、交流-生产、语言生产和异化、符号材料工作、语言工作的分配、机器和语言、主流阶层和对交流的控制、符号资本、意识形态和无形的工作、语言、生产和战争、作为礼物和市场的语言。维也纳的伯纳德不仅前来参会, 还积极地参与了整个组织工作, 而这个会议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件。

2005 年, 也就是罗西-兰迪逝世 20 周年之后, 伯纳德联合组织了纪念他